

主编:管益忻  
常务副主编:启文  
副主编:白卫星  
学术支持:  
齐桓仲父大战略研究院  
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业研究中心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改革和发展研究院

学术顾问:

巴曙松 蔡继明 陈东琪 陈全生 程恩富 迟福林 戴圆晨  
范恒山 樊 纲 高尚全 顾海兵 葛志荣 贺茂之 洪银兴  
黄范章 贾 康 江春泽 金 磐 李成勋 李江帆 李京文  
李维安 李新泰 刘诗白 刘 伟 任玉岭 宋洪远 宋守信  
宋养琰 谭崇台 王东京 卫兴华 魏 杰 吴 澄 徐长友  
晏智杰 杨家庆 杨启先 张国有 张曙光 张晓仙 张卓元  
赵人伟 郑新立 朱铁臻 周叔莲 周天勇 邹东涛

第 241 期 (总第 347 期) 2018 年 3 月 5 日 星期一 投稿邮箱:jjxzb@163.com

本刊订阅方法:网易“云阅读”搜索“经济学家周报”即可订阅。本报所刊载文章系作者观点,均不代表本报意见

# 经济学家

周报

## 经济学家定义高质量发展新方向

新年伊始,全年经济工作如何排兵布阵成为各界关注焦点。在 2 月 25 日召开的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 2018 年年会上,多位政学商界专家围绕“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主题,针对农村发展、地方政府考核等领域各抒己见,全方位地分析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如何确保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向高质量。

开宗明义,概念先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在做主旨演讲时就指出,所谓高质量发展,从微观层面来看,通常指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中观层面来看,是产业和区域

发展质量;宏观层面来看,是国民经济的整体质量和效益。当前,我国生产要素中的劳动力、资源、土地等红利都在消失,当前面临的最大的要素瓶颈就是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不足。

王一鸣直言,高质量发展阶段要适合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基本国情,不能简单以成熟经济体的标准结构作为我国的参照依据,还要充分考虑中国的大国特征;同时我国正处在结构的快速变动期,要充分考虑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特点,而推进高质量发展,

最根本的还在于深化改革,来增强经济的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

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白重恩看来,我国经济要实现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地方政府扮演的角色也要转变。过去数十年,我国经济以高速度增长为导向,地方政府要经历自上而下的考核要求和控制,尽管考核内容涵盖许多指标,GDP 增速只是其中一项,但实际上投资、财政收入等指标也都与 GDP 高度相关。这就导致地方政府会竭尽所能推高经济增速,导致近几年多

地投资回报率明显下滑。要确保经济发展转向高质量,转变地方政府激励方式显得尤为关键,例如将地区生产总值考核改变为地区收入总值考核,税收归属由生产地向消费地转型等。

“高质量发展一个重要的含义就是居民从经济增长中有更强的获得感”。白重恩指出,要实现这一目标,各地方需要有更好的公共服务,未来的三大攻坚战里面,精准扶贫、污染防治都是很好的公共服务,更高质量的消费同样重要。

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农业势必要摆脱低效率区间。中农办主任韩俊在解读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时指出,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管长远、管全面,所谓管长远,是指一号文件一直谋划到本世纪中叶,专注实现农村全面振兴;所谓管全面,是指文件不仅涵盖农业现代化、农村经济建设,还有大量篇幅描述农村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

(蒋梦惟 张畅)

## 百位经济学家调查:超半数认为房地产价格泡沫严重

2 月 27 日,由经济参考报与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联合发布了百位经济学家“2018 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问卷调查”,结果显示:51% 的专家认为“房地产价格泡沫严重,存在较大的金融风险”。

党的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课题组对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76% 的专家认为“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75% 的专家认为“着力解决实体经济供需失衡、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71% 的专家认为“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促进商品和服务质量持续提高”;57% 的专家认为“让绿色发展成为普遍形态,

形成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53% 的专家认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让创新成为发展的第一动力”;50% 的专家认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产权制度,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42% 的专家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

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定调,2018 年中国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强财政可持续性。那么,在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2018 年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空间在哪里?课题组对 2018 年中国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空间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80% 的专家认为“无论是税收政策还是财政支出结构,财政政策将更多向高新科技产业、精准扶贫、乡村

振兴等领域倾斜”;65% 的专家认为“进一步下调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税率、扩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范围等结构性税收优惠政策”;57% 的专家认为“加大基础设施领域开放力度,鼓励地方政府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对民间资本参与 PPP 项目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让 PPP 回归本源”;54% 的专家认为“进一步下调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税率、扩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范围等结构性税收优惠政策”;50% 的专家认为“继续落实并完善营改增试点政策,扩大减税效应”;42% 的专家认为“紧一般预算”与“宽广义财政”并行,预算赤字率不会进一步上调,大幅提高专项债券新增规模;22% 的专家认为“增值税更可能以完善、扩大抵扣范围为主”。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结果,2017 年

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规模为 13.53 万亿元,同比多增 8782 亿元。那么,专家将如何评价新增人民币贷款的流向呢?调查结果表明,72% 的专家认为新增人民币贷款“没有改变民间投资‘融资难、融资贵’的现状”;64% 的专家认为新增人民币贷款“保证了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扩张”;56% 的专家认为新增人民币贷款“加速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投资增长”;52% 的专家认为新增人民币贷款“没有进入实体经济,导致了投资增速持续下滑”;40% 的专家认为新增人民币贷款“信贷扩张因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不畅,其效应难以发挥”;36% 的专家认为新增人民币贷款“刺激了房地产市场的扩张”。

此外,课题组还对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

75% 的专家认为“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问题严重,导致银行业坏账水平提高,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51% 的专家认为“房地产价格泡沫严重,存在较大的金融风险”;48% 的专家认为“经济缺乏新的增长点,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换缓慢,创新仍未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新兴产业发展空间受限等”;44% 的专家认为“民间投资增速持续低于国有控股投资增速,民间投资增速回升缺乏可持续性”;30% 的专家认为“影子银行规模膨胀过快,导致国有企业的高杠杆率,且缺乏有效的监管措施”。此外,还有少数专家提出了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其他风险点:总量 TFP 的增速回落;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拉大;国际金融风险引起中国资本大量外逃;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等。

(宗和)

##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研究 ——兼谈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主要矛盾

■ 宋铮 芝加哥大学 Booth 商学院副教授

型研究都占据主导地位。理论问题导向型研究是现实问题导向型研究的基础,技术导向型研究则是现实问题导向型研究的重要补充。这是当前经济学研究在欧美国家的基本架构。

中国既有相似的地方,也有自己的特点。20 年前,中国经济学以思想型研究为主,针对经济体制的基本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其中不乏影响深远的成果。近 20 年来,伴随中国经济的全面市场化,伴随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国际化,学术型研究取得了跨越式发展,现代经济学的思维模式和科学方法已经成为各个年龄段经济学家的共同语言和主要研究手段。

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内完成学术语言的转型,这是全体中国经济学家值得自豪的成就,老一辈学者的宽容和支持尤其值得称道。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学者还在强调创建所谓独立于现代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学”。事实上,近 10 年来,中国经济学几乎所有的重要工作都是在认同现代经济学基本框架的前提下运用其具体方法研究中国现实问题。这种认识上的统一极大地促进了学术型研究的发展。

### 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主要矛盾

“日益增长的现实问题需求和逐渐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是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矛盾。而“逐渐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其实也是经济学全球化的体现,而且是一种以美国问题和价值观为主导的全球化。

但是,在充分肯定这一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一些不足的地方。虽然有些吹毛求疵,但我相信客观的批评是继续前进的动力。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技术型研究稍多了些,其中有用新的中国数据做中国问题的工作,也有用新的中国数据做以美国问题为导向的工作,还包括用新的理论模型来重新阐释一些中国问题的工作。与此相对应的是,现实问题导向型研究相对少了些,很多重要的现实问题往往得不到充分研究。虽然有不少探讨,在各类媒体上各式各样的观点看法也层出不穷,但有深度有系统的研究并不多见。

对比欧美国家,我们的差距不小。在美国,如果出现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一般都能找到几位在该领域做过系统研究的学者,发现一些参考价值很高的成果。即便是全新的题目,也可以预期在几年内就涌现一批专业的人才和成果,比如前面提到的有关金融危机的工作。

造成这一反差的原因很多,比如国内高水平经济学家的供给不足。一些学者虽然热情高涨,但欠缺系统训练和批判性思维,研究往往流于表面。我想强调的是,比较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从中

央到基层,从经费划拨到职称评定,国内权威和国际期刊论文数量已经成为考核的主要指标之一。另一方面,现实问题导向型研究涉及的内容相对较多,研究周期相对较长,对学者的综合能力要求也相对较高。因此,对中青年学者来说,他们面对一个投入和产出的权衡。做技术导向型研究要相对简单一些,时间短,成果发表的概率也有一定保证。在这种情况下,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不得不为生存需要让步。事实上,我甚至认为“日益增长的现实问题需求和逐渐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是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矛盾。

需要明确的是,在学术发展的初级阶段,计算高质量论文数量的做法是有积极意义的。毕竟高质量论文发表的本身就说明同行对这项工作的肯定。在过去的 20 年间,对高质量论文的重视是对中国经济学客观评价体系缺失的一种纠正,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化。但是,我想同时指出,“逐渐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其实也是经济学全球化的体现,而且是一种以美国问题和价值观为主导的全球化。不能清醒地认识这一点就无法甄别背后隐含的负面因素。

这种全球化的一个结果是美国学者,包括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学者构成主流经济学的主体,非美国学者在不知不觉中被边缘化。如果全球 95% 的经济学家都在研究以美国问题为导向的所谓理论问题,难道有助于人类的福祉?

毋庸置疑,美国是经济学研究的高地。如果经济学是纯理论研究,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化无疑有助于知识的创造和积累。但是,经济学主要是一门应用学科,研究涉及各类现实问题,不少具有比较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也作为一个政治经济体制比较特殊的国家,我们自然有必要反思以美国问题和价值观为主导的全球化。

用一个比较极端的说法,如果全球 95% 的经济学家都在研究美国问题或以美国问题为导向的所谓理论问题,这种局面是否有助于促进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已经讨论了中国投身于全球化的好处,现在来举两个例子谈谈负面影响。

我在三年前访问中国台湾中研院的经济所,那里有很多的经济学家,有些堪称世界一流学者。在过去的十几年,管所长和彭所长推进的国际化取得了很大成绩,有目共睹。我很想找些专家聊聊台湾过去 50 年的经济发展,这对认识中国的现状、判断中国的未来很有帮助。很遗憾,他们告诉我整个经济所只有一位研究员懂台湾经济,目前还不在台湾。所幸当时有位康奈尔大学的老先生 Henry Wong 在经济所访问,他是台湾经济专家。和他聊了很久,受益匪浅。台湾当然有其他机构专门研究台湾经济。但是,在台湾知识界精英云集的中研院居然找不到一位台湾经济专家,这不

得不说是中国经济学全球化造成的一种资源错配。

这种全球化的一个结果是美国学者(包括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学者)构成主流经济学的主体,非美国学者在不知不觉中被边缘化。由于远离美国,无法深入美国的现实问题,很多人最终选择了技术导向型研究。

偏重技术导向型研究的负面影响是削弱对于现实问题的判断力,中国台湾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再举一个中国的具体事例。过去几年美国的政界、媒体乃至学界都在批评中国通过操控汇率来实现贸易顺差。这种言论可以说是深入人心,从舆论上给中国政府和中国经济施加了很大压力。其实,从操控汇率到贸易顺差在理论上说不通,在实践中也做不到。

学过宏观经济学头两节课的学生都应该知道,贸易顺差和净储蓄(即储蓄与投资之差)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通过操控汇率来影响净储蓄几乎是天方夜谭。有趣的是,在我们这次获奖的论文《中国式增长》之前,竟没有经济学家站出来挑战这个显然的谬论。西方学者的沉默不难理解,中国学者的沉默就值得探讨了。

事后看来,美国政界和媒体对经济表现良好的国家或多或少有些酸酸的味道,各种貌似雄辩的言论背后也并不总有令人信服的逻辑,比如最近对于德国贸易顺差的指责,无聊得可笑。国家利益永远站在第一位,似是而非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占领道义的制高点。中国作为一个有其特殊性的大国,有一批精通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又立志中国现实问题研究的学者,在推动现代经济学自身发展的同时,对内可以为经济发展献计献策,对外还可以增进交流,减少言论上的摩擦,消除观念上的误区。

### 谨防被西方经济学“洗脑”

更糟糕的是变相的“洗脑”,“逐渐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使得经济学家们的研究更有倾向性。而中国需要的经济学研究是“现代经济学的本土化”和“中国问题的国际化”。

我最近做了一项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绩效的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的绩效提升很快,大型国有企业尤其明显。有趣的是,我们在宣讲这项工作的时候,一些学者告诉我们他们几年前就有类似的发现。当我们问他们为什么不做深入研究,得到的回答通常是他们对这一发现有所保留。

其中的原因可能有两个。首先,学术界更容易接受国有企业绩效相对下降的结论。要发表违背西方主流观念的研究成果,需要更多的努力,冒更大的风险,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另一方面,我感觉有些学者先验地排斥国有企业的绩效提升这一发现,觉得一定是哪里

出错了。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国有企业绩效是否确实有所改善,而在于学者对各种可能性是否抱有同等开放的研究态度。不自觉地偏向某些观念,比如国有企业一定搞不好。对一些确实存在的事实持有盲目否定态度,就是我指的被西方主流观念的一种“洗脑”。

### 中国需要的经济学研究

前面说明了偏重技术导向型研究的各种问题,那中国现在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研究?或者更具体地说,需要什么样的现实问题导向型研究呢?我在复旦大学的老师袁志刚曾经讲过,我们要做的事是“现代经济学的本土化”和“中国问题的国际化”。我觉得这两句话就是对中国所需要的经济学研究的高度概括。

现代经济学的本土化其实就是以中国经济现实情况为导向,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和发展现代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框架和方法是不分国界和政治经济体制的,本土化是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也是用中国元素去丰富现代经济学。中国问题的国际化是更高更长远的纲领。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和现代经济学中国元素的增加,我们不仅希望更多的中国学者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且也希望更多的国际学者加入我们的队伍。中国经济已经注定成为世界第一。但愿在不太遥远的未来,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经济问题成为最多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这是中国软实力提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如何实现这两句话呢?我觉得首先需要避免过分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建立标准化的学术评价体系是提高研究质量的方法之一,它的特点是可以简单有效地甄别出那些采用非科学方法或者胡乱套用现代经济学的低水平研究。或许并非所有“好”的研究都可以发表在顶尖学术期刊,但顶尖学术期刊基本不会接受“不好”的研究。但是,我们也应当认识到标准化学术评价体系的局限性,特别是认识到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发表有关中国现实问题研究的困难。鼓励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延长考核周期,减低论文数量的重要性,都应当有助于年轻人专注大的、有趣的现实问题,而非解决那些美国人自己都不太在意的小问题。

同样重要的是培养人才队伍。我总结了一个“四有新人”的标准:有独立思想,有现实意识,有扎实的学术功底,有全球的学术视野。老一辈学者在前两方面做得很好,而我们的优势在第三点。向前辈学习他们的独立思想和现实意识,并发挥我们自己的特长,是我们这代学者成功的基本要素。最后,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不能闭门造车,一定要具备全球视野,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经济问题的国际化。